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党化”抑或“学治”：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大学区制改革的动因分析

张 强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

摘 要:教育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其实施原因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需要立足具体的时代情境加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区制改革的实施,以“教育独立”为目标,不同于此前“党化教育”的宗旨。考察这一政策转向的原因,涵盖了个人理想、集体共识、政府支持和社会呼应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通过梳理这一过程,从个人到社会,由微观到宏观,有助于厘清大学区制改革的实施背景,认识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 大学区制;改革;动因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08-0114-06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8.026

The Analysis of Reasons of the University—district Reform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ZHANG Qiang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reform is a social engineering. Its motivation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the particular context. The university—district reform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overed the factors of personal ideals, collective consensus, government support and other aspects of social request. According to analysis of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the paper helps us to clarify the background of this reform implementation and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ion of the process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Key words: educational reform; university district; reason analysis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随即在教育领域开展了系统性的制度改革——“大学区制”,希望纠正教育混乱之弊,而收教育独立之效。借鉴法国教育制度的“大学区制”,在中央以“大学院”统管全国的学术事业和教育行政,在地方以国立大学管理本地的教育事务,力图实现“教育学术化”和“学术研究化”。此种制度设计,以“教育独立”为旨归,希望改变教育事业随同政潮起伏而无所归

依的窘境。经过蔡元培等人的积极推动,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通过了《大学院组织法》,开始实施“大学区制”改革,从制度层面启动了“教育独立”的尝试。本文重点关注“大学区制”得以出台的思想渊源和时代动因,即“大学区制”改革何以能够在彼时情境舍“党化”而行“学治”,从而为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张目?短暂的“大学区制”改革,试图超越政教合一的传统和现实政治

收稿日期: 2016-03-02

基金项目: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5DS03)

作者简介: 张强,男,甘肃陇西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高等教育史。

的乱象,建设新的教育制度体系,虽然由于制度困境和人事纠葛,改革半途而废,但是改革的进程则为思考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一、个人先驱:李石曾的教育努力

大学区制改革,以蔡元培“教育学术化”和“学术研究化”的理想诉求而被认为是追求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积极尝试。李石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长期隐而不彰。其实,无论作为留法学人对于法国思想文化的深刻认识,还是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创办各类学校,李石曾在大学区制改革前后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李、蔡相比,正是前者最先深入了解法国教育制度,并极力宣扬推崇,对于推进这一教育实验活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虽然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蔡元培与李石曾的作用各有侧重,但李石曾发挥的“起点”作用不可否认。作为大学区制改革主导者之一的蔡元培亦曾坦言:“中法两国学术上文化上之关系,……近三十年,则有吾友李煜瀛君、夏循垵君等。李君(石曾)发起俭学会与勤工俭学会,留法人数渐多;又发起华法教育会,而招待留法学生之机关,渐趋周密。”^[2]立足具体的历史情境,以1902年李石曾的赴法留学为标志,开启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新局面。作为制度引进的关键性人物,李氏在思想引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双重努力,为大学区制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与实践例证,是为此后大学区制改革的先驱。

游学法国期间,李石曾吸收了“互助论”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开展社会改造的指针。1906年从蒙城农业实用学校毕业后,李石曾转入巴黎巴斯德学院。在此期间,他遇到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Paul Reclus),经其推荐接触了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所著的《互助论》、陆谟克(Lamarck)所著的《生物互助并存论》、和居友(J. M. Guqau)所著的《自然道德论》,初步产生了“互助论”的思想萌芽。通过对蒲鲁东(Proudhon, Pierre-Joseph)思想的深入研究,李石曾以蒲氏的“联邦论”作为落实思想的制度依托,积极提倡分治合作。他认为:“蒲氏主张合作主义,反对集权主义(Centralisme)。合若干自由之人民为县乡,合若干自由之县乡为省区,合若干自由之省区为邦国,合若干自由之邦国为世界,此由合作主义达到自由平等之世界也。”^[3]从而贯彻由个人、地方及世界的自由精神与合作理念。这种认识,激发了

他积极实践以互助和联合为特色的地方改革事业。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力邀李石曾与吴稚晖前去除任。吴坚辞不就,李石曾则担任了生物学及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他开始了在北京城郊的社会文化建设活动。

“自民国七年开始,我与三五同志如蔡子民、夏坚仲、顾孟余、段子均诸先生,及法医家贝熙业博士,曾于故都西北郊区,以碧云寺与温泉村为宛平县开七十新村社会建设之场所;如大中小学、疗养院、合作社、农村银行、图书馆、职业教育、传习所、男女各校,相当普遍;公路电话电力等公用事业,亦由吾人得到军政经济社会文化各方之热心赞助,成效甚速;西人与村民几认为神话;盖社会事业进行之神速若此者,极少能与伦比,值得以专书详记之。”^[4]

借助于个人影响和倾力推动,李石曾立足本土实践,吸收域外思想,开展了以西山温泉事业为代表的社会建设试验和以中法大学为核心的文化教育活动,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其事业,包括北京中法大学、上海药学专修科;大学下设中小学部,包括高级中学校、商业专科、孔德学校、西山温泉中学校、碧云寺小学校、温泉小学校;特设部包括中法图书馆、中法大学陈列馆、西山天然疗养院、温泉天然疗养院、第一、二、三农林试验场、两个测候所、天文台、磁力台等,逐渐形成了一个机构完备、互相衔接的小型学区,初步尝试在中国情境中试验法国大学区制。“盖中法大学虽依据中国学制,然亦采取法国之所长。即法国大学包含大中小各校,使有衔接之效。不似他国学制,大学只就中学以上之学课而言。中国大学固亦有附设中小学部,然不过一校之附属。至北京中法大学,大中小各校并立,远及数十里,实亦大学区之制,……于此而言之,不仅关于一校,实亦一种学制之试验也。”^[5]此番工作,为李氏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试验大学区制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操作经验。

李石曾在法国的实践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观念,确立了其在推介法国思想与制度方面的先进地位。凭借丰厚的人际资源和社会声望,通过游走于中法文化界之间的努力,他从西山“温泉事业”起步,借助里昂—北京中法大学等一系列高等教育机构和附设中小学校,开始了法国大学区制在中国的初步尝试,开一代风气之先。

二、集体共识:留法群体的合作功效

以李石曾赴法为先导,逐渐在巴黎、里昂聚集了

一批以社会改造为使命的革命同志。他们以共同的留法经历和各自的思想倾向,致力于借鉴法国经验实施社会改造与教育改革,以求平等、自由、博爱精神在中国的传播。这种植根于私谊和公利的关联,传播了革命思想,培养了学术人才,同时也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大学区制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与人才基础。

在这一革命群体中,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志趣相投,终成至交,并以共同的革命行动和社会理想,形成了“民国四老”的关系格局。他们在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事业和民国建立之后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交往,立足于门生故旧的私谊。1892年吴稚晖赴京参加会试时即有拜谒李石曾之父晚清重臣李鸿藻。1902年在沪期间,李石曾在张园旁听演说会认识了恰是李鸿藻的门生蔡元培。张静江的岳父姚炳然亦是李鸿藻的门生,李石曾因此经人介绍初识张静江,同时,共同的游学志向也成为他们彼此关联的纽带。李石曾与张静江一见如故,随即定立了“世界之游”的志愿与计划。到了1902年,“我们的信约终于我二十二岁,他二十六岁的年底实现;我们同登‘安南’号法国邮船,由上海到马赛一个月海上生活,确定了我们的新人生观与一生的共同事业。”^[4]赴法前夕,李石曾曾经上海拜望吴稚晖,以示钦慕。“吴建议先生此去法国,应多协助国内青年留学海外,使留学生愈多愈好,先生颇然其意向,遂欣然订交焉。”^[6]至于蔡元培,留德赴法亦是不遗余力,积极求取新知,以图力矫时弊。这种在私人交往和留学共识方面的契合,初步奠定了他们相互合作、共谋社会改造的基础。

1902至1907年间,李石曾、张静江在法,吴稚晖因“苏报”案被通缉而赴英,蔡元培往德,四人因此有机会同学共进,彼此交流。1907年1月,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在1906年成立世界社和组织中华印字局的基础上,筹备《新世纪》周刊,发表反清言论,鼓吹革命,宣传无政府主义,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其时,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提供文稿,张静江从事商业贸易为刊物提供经费。1907年5月,蔡元培随同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赴德留学,随后参与其中,并作精神上的呼应和文字上的供给。以周刊为载体,该群体致力于启发民智,提倡人道,发刊宗旨云:“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7]同人之间,“吴

(稚晖)、李(石曾)久居法国,常与无政府党人游,而崇尚其主义。更得张静江之助,于一九〇七、八年发行《新世纪》于巴黎,斥强权,尊互助,于各国政府,皆无怨词。对满洲更恣情毒骂,杂以秽语,使中国从来帝王神圣之思想,遇之如服峻剂,去其积滞。吴、李于民族革命,亦热心致力,与后之高谈‘安纳其’主义,不问政治是非者殊科。精卫与孑民、溥泉(按即张继),亦渐有无政府之倾向;惟溥泉比较浪漫,不若精卫、孑民之通,而自然有节也”^[8]。围绕《新世纪》周刊,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拉马尔克等人的学说获得传播,并对诸位参与者产生思想方面的重大影响,促进了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对政治的相对疏离和对社会事业的积极投入。二次革命失败后,面对袁世凯的通缉,国民党主要成员纷纷避祸欧洲,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曾仲鸣等人先后赴法。通过编译书籍,办理俭学,留法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以“四老”为核心的国民党上层集团。这种松散的政治联盟,立足私谊与学缘,虽然在以后分道扬镳,但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声气互通和政治合作,为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实践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推行社会改造与教育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

这种思想上的共识,进而形成了实践中的合作,尤其是蔡元培与李石曾在文教领域的合作,推动了留法俭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民国初年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李石曾创办俭学会,两人由此开始了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合作。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北顺天高等学堂校舍旧址成为留法预备学校的校址,招收学生补习法文以作留法准备。当一战爆发,留法学生陷入困境,李、蔡二人组织留法西南维持会,接济困难学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维持留法教育的继续进行。1915年6月,李石曾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发起“勤工俭学会”,并于1916年3月联合蔡元培、法国人欧乐发起筹组华法教育会,6月26日举行成立会。其组织目的有四端:一曰扩张国民教育,二曰输入世界文明,三曰阐扬先儒哲理,四曰发展国民经济。^[6]以此为纽带,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的努力下,众多勤工俭学的学生奔赴法国,半工半读。这些行动,为法国思想与制度的输入创造了条件,充分体现了中法文化的交流与互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在以“四老”为核心的上层力量之外,伴随着留法勤工俭学和里昂—北京中法大学的扩充,进一步壮大了留法学术力量。1917年

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留法学人入校执教,计有李石曾、李书华、萧瑜、林榕等人。其后在北京大学,留法学人势力渐增。“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9]北大以外,1920年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成立,设立服尔德学院、孔德学院、居礼学院、陆谟克学院。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于10月开学,招收了从北京、上海、广州录取的105名学生。至此以后,留法学人逐渐在学术界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致力于传播新知,钻研学术。

从1902年李石曾等人赴法,随着赴法勤工俭学的起落以及中法大学体系的建立,中法文化交流通过输送华工、派遣勤工俭学生、出版报刊杂志等方式,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取得了显著成效,从而在政界与学界形成了钦慕法国思想制度的改革力量。虽然其时纷乱的政局尚未能提供一个稳定的舞台以供彼辈施展,但随着国民革命事业的推进以及留法人士在国民党政府中作用的日益彰显,这就为此后他们在教育领域开展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体现在文化方面是思想学术的交流,反映在政治领域是领导集体的形成。通过这样一种文化理想与政治权力的合流,其渐与国内纷乱政局中的社会要求相呼应,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教育的独立。

三、制度支持：国民政府的权力分工与教育转向

教育制度改革设想的落实,在个人倡导与集体共识的基础上,尤其需要执政力量的配合协作。“我们要认识到,浪漫主义固然能引起人的奇思怪想,但在政治场域中实践浪漫主义,确实需要极为特殊的政治/文化资本以及相关语境的水到渠成。”^[10]承袭法国浪漫主义之平等、自由、博爱理念以求教育独立的大学区制改革,尤其需要特殊的政治/文化资本支持。北洋军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息,教育界经费支绌,濒临破产,政府无心亦无力充实教育,惟以武力整肃而使其服从。有志于改革教育事业的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此政潮跌宕、教育破产的困境中

勉力维持,努力传播新知,洗刷政治,期以协作共治的路径实现社会改造。其行动立场,在思想制度而非权力官位,在改造政治而非参与政治。这种取向,促成了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格局的划分,为大学区制改革提供了具体操作的政治支持和现实语境。

大学区制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文化资本,建基于共同革命事业基础上形成的紧密联系。“民国四老”中,善于经商的张静江资助革命甚为有力。孙中山称:“自同盟会成立后,……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11]一九二一年蒋介石致张的手书中亦言“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12]从中可见张氏在国民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李石曾于1906年8月通过张静江的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6月,孙中山抵达巴黎并参观了李石曾创办的豆腐公司,对其赞誉有加,并在《孙文学说》中加以阐扬:“吾友李石曾留学法国,……以研究农学而注意大豆,以与开‘万国乳会’而主张豆食代肉食,远行化学诸家之理,近应素食卫生之需,此巴黎豆腐公司之所由起也。”^[13]在过往相从里,李石曾由此支持革命理想,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而就任筹划全国铁路总办,李石曾与孙中山晤谈,议定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畅通,李石曾筹划全国教育文化增长,通过交通教育事业的并进而实现国家的富强。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与军阀混战的更替,以上计划都无法得到落实。至于蔡元培、吴稚晖,亦是以革命为志业,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迨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亦获得了施行其社会理想的舞台。按照当时分工,李石曾坦言:“蒋谭诸公等从事军政权要,吾人则致力文化经济建设事业。”^[14]在文化理想与政治权力相互纠合的场域内,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以笃行其实,不务其职的姿态进行教育改革。据曹聚仁观察:“国民党主政这二十年中,国民党的元老派,包括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朱家骅这几位元老在内,他们似乎和当权派取得了如次的谅解:凡属于北京大学、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的人事任免,得由元老派全权做主,因此,国民政府时期,这三个文教机构,都属于北京大学的势力圈子。”^[15]这些民国元老作风气派各有不同,但在根本观念上趋于一致,皆推崇教育之作用,以期社会之进步。蔡元培与李石曾虽然在北平大学区的设置上出现裂痕,并有派系夺权之争议,但

就倾力于推动大学区制以求教育独立、学术发展的初衷,并无二致。

通过北伐,国民政府从囿于两广一隅而执掌中枢,获得了合法政府的地位,也开启了政权鼎革之后的制度建设进程。教育方面,立足以党治国方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思想在北伐前后渐趋发达,训练学生而为一党之用。1925年1月,广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广东大学:“服务教育机关之职员有入党必要,……一、所有该局(教育局)职员,均劝令一个月内加入本党,逾期不入者须提出正当理由。……二、暑假后所有市立学校校长应以党员为必备资格,所有教职员应尽先聘用合格之党员等因”。^[16]其意图,不外以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通过对教育的控制达到统一思想,巩固政权的作用。1926年2月,广州国民政府设立的教育行政委员会实际承担了掌管中央教育机关,指导地方教育行政的职责,是为教育主管机关,其方针政策亦以“党化”为方向。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增派蔡元培、李石曾和汪精卫三人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经此变动,钦慕法国大学区制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与李石曾以教育改革实践其教育理想,而教育制度建设之取向也随之更易,力求通过大学区制避免政治的纷扰而求得教育的独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于1927年6月7日通过了蔡元培提出的变更教育行政制度文件,“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区内之教育行政,由大学校长处理之。凡大学,应设研究院,为一切问题交议之机关”^[2]。由此,拉开了大学区制改革的序幕,也开始了由“学治”代替“党化”的尝试。

考察这一过程,从“党化教育”转向“教育独立”,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内部斗争在教育领域造成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从其教育理念出发而进行的积极努力。他们无意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将关注点置于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造层面。其努力的集中体现,即是大学区制的试行。文化理想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促成了新一轮教育制度改革政策的出台。

四、时代呼声:“教育独立”的社会思潮

教育改革的实行,始终立足于现实情境的要求和制度改造的需要。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至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后,北方政局动荡,京津地区教育事

业在政治压迫和经济窘困的冲击下举步维艰。1924年5月北京政府为了解决北京高校的经费问题,召开内阁会议通过发行特种国库券100万元作为北京国立八所专科学校经费。至9月北方发生战事,此款被拨归军用,北京国立八校又因经费无着,延期开学。教育事业举办之艰难,可见一斑。1926年,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枪杀爱国学生,缉捕进步人士。经过两次直奉战争,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此时的奉系虽在政治力量博弈中暂居优势,但在各方敌对势力包围中的军政府只是勉强维持,无心亦无力改进彼时处于危机中的教育事业。面对此种情形,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中国的教育已经快到破产的时期,也不全是杞忧罢了。从改建学校以来,中国的教育,现在总算最危险了!试就北京、武昌、上海、广州几个大都会加以考查,教育界不是奄奄一息,就是空泛虚浮,这不是很可怕的危机吗?”^[17]有鉴于此,全国各地纷纷要求教育经费独立,保障教育事业,摆脱生活与政治方面的压迫。其时,由经费缺乏引发的制度反思,形成了教育和政治改造并进的认知,催生了“教育独立”的时代诉求。

“教育独立”思想的形成发展,始终伴随着经济上的匮乏与政治上的动荡。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事业,无法脱离政治而存在。在兵灾政争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的社会情境中,学校师生遭受压迫,教育政策时无定见,于纷乱中求中立,自是题中之义。“教育界觉得政府之不可靠,于是有‘教育经费独立’的要求。后来因宗教及政党问题在教育上引起种种纠纷,于是乃由教育经费独立,推广及于教育离政治宗教而在立法上行政上完全独立。”^[18]鼓吹者基于时代乱象,希望在经费来源和制度保障方面,形成教育独立于政治和宗教的态势。早在1912年蔡元培就区别了“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于政治者”的两种教育类型。1922年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独立议》:“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2]主编《教育杂志》的李石岑于1922年2月发表《教育独立论》,主张教育经费与教育立法、教育行政皆行独立。留法归来的周太玄亦于1923年11月发表《我国教育之集中统一与独立》,从教育立法、教育行政、

最高学术机关、教育经费四个层面论述教育独立之价值,并以法国大学区制为依据,主张将全国划为十学区,“每区择适中及重要地点,设一区学院、一国立大学及一区教育会议,综理一切高等教育、中级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及其他特种教育等等。各区学院及大学,均统属于教育部;但其内部组织及更改,则应有最高教育会议将其议定之条例,交教育部颁布执行之”^[19]。这种构想,即将国内的教育独立思潮与法国的大学区制度初步沟通,为制度改革提供了舆论上的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全国教育事业,处在战乱与破产的窘困境地,因压迫而生独立的要求,由反思而有改革的愿望。前者基于生存的考虑,形成了“教育独立”的时代呼声;后者立足发展的前瞻,热衷于“大学区制”的借鉴引进。内部的改革需要和外在的制度吸引,通过蔡元培、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积极倡导,得以在政局甫定之际,以大学区制改革的形式正式确立。这两种愿望的合流,也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展教育改革提供了现实操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五、结语

任何一项教育改革的背后,都有复杂的影响因素。“大学区制”改革作为中国教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体现着平均输入欧美制度的借鉴努力,自有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犹可关注者,是为制度层面的突破。此番“以学治教”的改革尝试,与此前国民党“以党治教”的方针相悖,却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取得优势并得以实施,首次在教育制度层面为“教育独立”提供了保障。其中缘由,首先在于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从法国革命精神与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资源,以期实现教育独立的理想;通过面向海外而着眼国内的改革取向,借助政治联合的操作方式,他们获得了开展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文化资本;当这种改革愿望与“教育独立”的社会思潮合流,新制度的推行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虽然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改革操作自身存在的问题,“大学区制”的改革昙花一现。随着1928年10月23日大学院的废止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恢复,“教育独立”的理想宣告终结,但政治与教育的张力却从未减弱,并且随着国民党的统治而进一步加剧。

[参考文献]

- [1] 刘晓. 李石曾与中华民国大学院[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8(2):145.
- [2]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488,515,377.
- [3]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M].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0:248.
- [4]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李石曾先生文集(下册)[M].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0:141,68.
- [5] 李石曾. 中法大学概况[J]. 中法大学半月刊,1925(1). 转引自葛夫平. 中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19.
- [6] 杨恺龄. 撰. 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15,32.
- [7] 《新世纪》发刊之趣意(1907年6月)[A]. 高军,等,编.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G].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5.
- [8] 胡汉民. 胡汉民自传[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75.
- [9] 顾颉刚. 顾颉刚自传[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9.
- [10] 叶隽. 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3.
- [11] 杨恺龄. 撰. 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7.
- [12] 万仁元,方庆秋. 蒋介石年谱初稿[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55.
- [13] 孙中山. 孙中山文选[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17.
- [14]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吴稚晖先生纪念集·吴稚晖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G].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15.
- [15] 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485.
- [16] 舒新城. 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351.
- [17] 刘薰宇. 中国教育的危机[J]. 教育杂志,1927,19(1):1.
- [18] 舒新城.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84.
- [19] 周太玄. 我国教育之集中统一与独立[J]. 教育杂志,1923,15(11):6.